

中国
少数民族文献探研

李杰

民族出版社

ZHONGGUOSHAOSHUMINZUWENXIANTANYAN

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探研

李 杰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探研 / 李杰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 6

ISBN 7-105-05085-3

I. 中… II. 李… III. 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中国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041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19.80 元

该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绪 言

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的祖先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载之于文献，习之于后世，闪烁着灿烂的光辉。历史文化文献异常丰富，真是浩如烟海，堪称世界之冠。

很早以来，我国的知识分子便不断对前人的文化遗产加以整理和利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推动中国文化的不断发展。所以，今天在我国存留有大量的、可供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汲取养分的古代文献记录材料。

“文献”，这个名词习用已久。《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所说的“文献”，即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郑玄以文释为“文章”，以“献”释为“贤才”。

“献”释为“贤”、“贤才”，在古代典籍中，是不乏其例的。《尔雅·释言》：“献，圣也。”《谥法》：“聪明睿智曰献。”皆贤之意。《尚书·皋陶谟》“万邦黎献”（此语见今本《尚书·益稷》），伪孔《传》：“献，贤也。”又《尚书·洛诰》“其大惇典殷献民”、《尚书·酒诰》“汝劓毖殷献臣”与“越献臣百宗工”等各句中的“献”字，《传》、《疏》亦皆释为“贤”、释为“善”。至于以“文”释为“文章”就容易理解了。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道：“文，典籍也；献，贤也。”

清代刘保楠《论语正义》：“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近代刘师培在《文献解》中说：“仪，献古通。书之所载谓之文，即古人所谓典章制度也；身之所习谓之仪，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孔子言夏、殷文献不足，谓夏、殷简册不备，而夏、殷之礼又鲜习行之士也。”刘师培从仪、献同音通假的角度着眼，以“仪”释“献”，而“仪”有“威仪”义，所以把“献”解释为“身之所习”、“动作威仪之则”。《汉书·艺文志》：“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威仪，亦礼也。所以，刘师培认为，献不足，就是“夏、殷之礼又鲜习行之士也”。“献”释“威仪”，意指习礼之士，和刘保楠释“献”为“秉礼之贤士大夫”的意思相同。

古代，由于文字很少，只能记录一些君王的文告、国家的政令等文件，而大量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活动都还得凭着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这就是使得我们祖先既重视用文字记录在典册上的历史，同时也十分重视由先人那里口耳相传下来而记录在人们脑子里的历史。《尚书·多士》记载周公对殷遗民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墨子·贵义》说，“周公旦朝读书百篇”，虽然可能有夸大之词，而西周建立之时，确有典册可读。虽有典册记录着殷朝的史实，但在武王灭殷之后，还是要郑重地访问箕子，征询他关于治理天下的意见，来吸取殷朝统治者的统治经验，以弥补典册不足的缺陷。《尚书》中的《洪范》篇就记述了此事。

春秋时期，周王和各国诸侯遇有典册上没有记载而自己又不了解的古史今事，遵循惯例，就向那知识渊博，通古知今的“贤者”求教，征询意见。《国语·周语上》记载：“（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曰：‘是何故？固有之乎？’”于是内史过从神道联系到人事，证之以夏、商、周三代的兴亡史，说明“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左传》僖公六年记载，这年夏天，齐、宋等国伐郑。秋天，楚成王围许以救郑，诸侯救许，乃还。到了冬天，“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绖，士舆櫜”，到楚国的

武城去见楚成王。许僖公本是去请罪，但是楚成王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就“问诸逢伯”。大夫逢伯回答说：“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桀，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楚成王就根据逢伯所谈的方法，学着周武王的做法处理了这件事。春秋时期，会盟是各国交往中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而且这一活动相沿已久，到这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作为当时各国君主处理会盟礼仪等方面的重要依据。

孔子在当时，当属于知识渊博的贤者。他不仅学习典籍知识，而且重视向人求教从典籍上学不到的知识。《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史记·孔子世家》：“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郟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于是讲述了黄帝、炎帝、共工、太皞到少皞分别以云、火、水、龙、鸟命官的原由。在孔子的眼里，郟属四夷之国，而孔子对四夷是持蔑视态度的，《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韩愈在《原道》中就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但是，当他听说一个远方小国的君主能详述中原各国已不得闻知的前古官名之沿革，感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就“见于郟子而学之”。在孔子看来，问，就是学，所以他不肯放过任何一个通过向人求教获取知识的机会。《论语·公冶长》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说，卫国大夫孔圉，为什么用“文”字做他的谥号呢？孔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学”和“问”是“文”的两个方面，同等重要，后世把人们掌握的知识称为“学问”，是有道理的。

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自序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

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马端临沿依郑训，其书取材于两个来源，一是书本记载，一是贤者言论，是一部名符其实的《文献通考》。马氏用叙事和论事来区分文与献。“文献”之“献”，是指人，这部分人所以被称之为“贤”，是因为他们知识渊博，通古知今，叙古事而不谬，论当今而合礼，所以称为贤者之言。这些贤者之言涉古史今事，有些可能在典册中有简单记载，但有不少还没有被用文字记录在典册里，只是保存在人们的脑子里，流传在人们的口头上。载之典册者谓之“文”，不载典册而闻之于贤人之言者谓之“献”。那么，“献”是可以变之为“文”的，昨日之“献”，今日用文字录载于典册，即是所谓“文”了。他是把典籍中记载的叙事部分称为“文”，论事部分视为“献”。我们可以这样说，马氏的所谓“文献”，大都来源于文字记录的材料，总的来看应属“文献”。他对二者的区别，只是在内容上一为叙事、一为论事而已。

迄今为止，关于文献这个名词仍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上面所说的，就是古人的解释，古代经籍把文献看成是一个联合结构的名词性词组。另一个是今人的解释，现以《辞海》和《辞源》为代表。《辞源》释为：“文献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辞海》释为：“文献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也可以这样说，文献就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从这个概念来看，文献是知识、记录方式、记录材料的统一，三者缺一不可。

我国有大量的汉文文献，也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地处边陲，自古以来，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些土地上。从秦汉以来，汉族知识分子用汉文记录了不少

少数民族地方的情况；一些少数民族中的知识分子也用汉文或少数民族文字写下了不少的著作。在这一些遗留下来的古文献中，既有关于物产、交通、气候等方面的资料，也有关于政治、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记录。还有一些是关于有着古老、丰富和具有民族与地方特色的文学艺术，这是祖国文艺宝库中不可偏废的宝贵财富。

用汉文记录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方的情况，以云南地方文献为例言，由于前人的重视和辛勤劳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如自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专载云南地方民族史事以来，《前·后汉书》及此后历代“正史”，都有比较系统的或分散于各“传”、“志”中的有关滇事的大量记录。又编年史如《通鉴》、《明通鉴》，政书如《文献通考》、《通典》、《通志》、《会典》，历代“统一志”等，于云南历史、地理诸方面也都历代相承地作过系统载述。个人著作有关滇事的更多，最著名者如东汉杨终《哀牢传》，晋代常璩《南中志》，李充《云南风俗记》，唐代袁滋《云南行记》，韦齐休《云南行记》，李德裕《西南备边录》，樊绰《蛮书》，窦滂《云南别录》，韦瑄《云南事状》，宋代辛怡显《云南录》，邓嘉猷《西南备边志》，元代张道宗《记古滇说》，张立道《云南风土记》，李京《云南志略》，明代韩宜可《云南稿》，彭纲《云南总志》，杨慎《滇载记》，田汝成《炎徼纪闻》，诸葛元声《滇史》，谢肇淛《滇略》，徐霞客《滇游日记》，清代冯甦《滇考》，毛奇龄《蛮司志》，谢圣纶《滇志略》，檀萃《滇海虞衡志》，倪蜕《滇云历年传》等等。另有专纪各民族及南诏、大理的专著，最早者如传为唐人的《白古通》，此后有明代钱古训《百夷传》，阮元声《南诏野史》，顾应祥《南诏事略》，不明作者的《土司底簿》等。又清代齐召南《水道提纲》，专章记载有关云南水道，李诚《云南水道考》对云南水道的考述极精审。又如清代吴其濬《滇南矿产图略》，戴瑞徵《云南铜政考》于云南矿

产及铜务均有系统详明的载述。其他有关云南民族、山川、物产、边事、艺文、古迹等各方面的专书以及有关滇事的杂记、随笔、滇人著作的别集、总集、文集、诗集等，仅各史《艺文志》、《经籍志》及各省、县地方志中所著录或涉及者，不下数千余种。又官私纂修的地方史志，自元代李京《云南志略》、明洪武《云南志》起，明代官修通志八次，清代官修通志六次，计至民国《新纂云南通志》滇中省志凡十八次纂修，至于云南所属各府、州、县志，几于四分之三以上的地、县，自元、明以来都先后纂修、续修，其中已刻未刻及手稿、长编等，其数亦应以千计。作者绝大部分是汉族知识分子。

元代散曲、杂剧作家中，涌现出一大批擅长于运用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其中，杂剧作家有李直夫，（即蒲察李五，女真人，剧作有《虎头牌》等十一种）^①、丁直夫（西域人）、杨景贤（蒙古人）、兰楚芳（西域人）、全子仁（撒里高昌人）、金元素（康里人）、金文石（康里人，元素之子）、王景楡（女真人）、月景辉（也里可温人）、赛景初（西域人）、汴仲易（西域人）、虎伯恭（西域人）^②。散曲作家有不忽木（康里人）、贯云石（畏兀儿人）、萨天锡（回回人）、奥敦周卿（女真人）、阿鲁威（蒙古人）、阿里耀卿（西域人）、阿里西瑛（西域人，耀卿子）、蒲察善长（女真人）、孛罗（蒙古人）、童童（？）、萨昂夫（西域人）等，他们的作品，都有相当的造诣。定居内地的少数民族中，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能运用汉文与传统格律写作的人，如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刺、三廷圭、聂古相、丁鹤年、高彦敬、康里子山、达兼善、雅正卿、斡克庄、鲁至道、余阙等，都有实名。回回人萨都刺，字天锡，他家世居雁门，以写作宫词著称，清婉流丽。他的词继承了苏（轼）词的豪放风格，沉郁苍凉。

元代三部农书之一《农桑衣食撮要》是畏兀儿人鲁明善撰写的。这本书是他在安丰路（今安徽寿县）任肃政廉访司官员时写

的。此书于元延祐元年（1314 年）出版。该书共分十二月令，按月记载农事操作和准备，对于农民很有用处。修撰辽、金、宋三史，是元代文化建设的一大盛事。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相继在中国北方统治了一个世纪以上。而汉族建立的宋王朝虽然前后统治三个世纪，但始终未能统一全中国。“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年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参加修撰三史的有蒙古人、畏兀儿人和汉人。

以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而言，汉文古籍 30139 种，含民族学科图书 10131 种，占汉文古籍的 34%；藏文古籍 843 种，满文古籍 220 种，蒙、彝、傣、纳西等文字古籍 37 种。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方志 8264 种，十一万余卷。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地方志 3200 种，约占全国现存方志的 38.5%，也可谓收藏丰富。其中内蒙古地方志 41 种，宁夏地方志 9 种，青海地方志 8 种，新疆地方志 78 种，广西地方志 58 种，贵州地方志 66 种，云南地方志 125 种，西藏地方志 44 种。有的版本极为珍贵，为民族大学图书馆仅有。如《江川县志》清光绪抄本、《新疆四道志》抄本、《开化府志》抄本③。

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除回、畲通用汉文外，只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满、纳西、苗（黔西地区）、景颇、傈僳、拉祜、傣、纳西和佤等十几个民族有文字，无本民族文字的民族，自然就没有文字记录的文献了。这就是民族文献所面对的现实。

没有文字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主要口耳相传，代代承袭。正如侗歌中所云：“古人耕，老人谈，一代一代往下传；树有根，水有源，好听的话儿有歌篇；没有文字好记载，侗家无文靠口传。”其实，汉文文献早期也是靠口耳相传。这种口耳相传的材料，在古代便是史料。过去学者把古代的传说、言论和书本记载的并重也是这个道理。当然不能

因汉族文字问世早，历代留存了大量文献，无须再将口头流传当做文献，从而便对少数民族的文献有所轻视，不仅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而且势必有损于对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文献包括文学，而文学包括作家文学和口头文学。少数民族文献不仅限于印刷品，不论翻历史还是看现实，民族文献应该是包括口头流传的口碑文献。口碑文献蕴含丰富，包括神话、传说、史诗、叙事诗、情歌、寓言、故事、谜语等等。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中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包括藏、蒙、满、彝、傣、纳西等文种。其中不乏珍贵的文献或已绝版的书籍。如藏文《大藏经》有纳塘版《甘珠尔》部、《多仁班智达传》手抄本、《贤者喜宴》初印本、宁玛派契经《伏藏》，均属一级特藏。蒙文《蒙文汇书》、《蒙古秘史》、蒙汉合璧《圣谕广训》、满文《盛京赋》、彝文《西南彝志》、傣文《德宏傣文》手抄本、善本《六种夷语》（含彝文和五个地区的傣文）、纳西文、察合台文手抄本。此外，馆藏拓片 1153 种，其中包括西番、梵、西夏、回鹘、突厥、女真、蒙古、藏、满九种古文字④。

在如此大量的文献资料中，凝聚着各族人民千百年来 的思想智慧，保存了各族人民千百年来 的进化史实，是极可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但由于历史局限，封建社会中的产物，不能不打上封建社会烙印。它们的观点立场，不能不是封建主义的、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充满了民族偏见的。采摘使用资料，每每主观臆断，形而上学，致失其实。而写作编纂的方式方法，更多因陈沿袭，少于创革。在文字的运用上，则或故炫高古，或偏于藻饰，或曲为隐讳，或好怪搜奇。甚或讹误叠出，矛盾互异，述事杂芜，议论支离，辗转抄袭，重出复见，凡此种种，实难尽言。

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研究，既云“研究”，当如何才能正确对

待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用什么方法研究是值得重视的大问题。

首先，是如何对待少数民族文献，就是看如何正确掌握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从“中国”的概念看，并不是专指任何一个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而是众民族的民族和民族政权都包括在中国的范围之内。在我国漫长的历史时期，有的王朝是汉族建立的，如秦、汉、隋、唐、宋，称为“中国”；也有的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如魏、元和清朝是由鲜卑族、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也被称为“中国”。以中原为正统，以“中国”为正统，是一个非常明显、明确的事情。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具有多种信仰的国家。宗教信仰是我国各民族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原始人类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还不能理解周围经常发生的各种现象，如风雷雨电、地塌山崩、自然灾害、人的生老病死等可怕现象，结果在心灵中产生了错误的虚幻的反应，认为在人的背后总有一种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支配着人们的命运。于是引起了对各种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量的崇拜，并企图用各种方法祈求它们降福消灾。这就逐渐形成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各种鬼神崇拜和自然崇拜。总之，原始宗教乃是由原始人类对于生理现象的不了解以及对各种自然力量的畏惧，无能为力而产生的。所以少数民族古文献不少部分是关于宗教的，其中有些迷信色彩相当浓厚。

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相联系。我国各民族都有程度不同的宗教信仰，而且大多数民族都分别信仰世界三大宗教中的一种。有些民族几乎是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例如云南的傣族、布朗族和崩龙族即全民信仰小乘佛教，藏族即全民信仰喇嘛教，回族即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久而久之，以致形成了某些宗教节日内容与民族风俗习惯融为一体。当然，宗教问题又不能和民族问题划等号，因为信仰一种宗教的往往是若干个民族，例如信奉佛教

的除汉族外，还有藏、白、彝、佤、布朗、阿昌、拉祜等众多兄弟民族。所以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既是有联系又是有区别的。

清朝雍正皇帝在批驳反满的汉族文士说：“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人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訛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戎狄而外之也。”^⑤

雍正反对华夷之限，他主张在中国的土地上，不论是哪个民族，唯有德者居之，丝毫没有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满族而不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皇帝之意。

其次，我国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地域和地理条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水平，影响着各民族的发展方向。各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又受到周围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影响，因而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又不孤立绝缘。就外部关系来说，它和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文化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就内部关系来说，它又是由若干文化领域的子系统构成。因此，任何一部文献，无论其属经、史、子、集，都是整个民族文化中的一因子，它和其他学科文献之间，存在不同层次的联系。所以要真正了解一部文献，必须有多学科知识，必须联系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对这部文献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以《格萨尔王传》为例言，其史诗在国内外影响较大的是清朝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版本，这一年在北京用木刻出版了七章本蒙文《格萨尔可汗传》，从那以后引起国内外的注意。蒙文版的《格萨尔可汗传》流传于广大蒙古族聚居区，国外则流传于蒙古国，原苏联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等地。藏文版《格萨尔王传》在国内广大藏族居住地、土族、纳西族等地区流传，国外则流传于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地。我们必须根据这部史诗本

身的严密的理论系统，从多学科、多侧面、多层次加以研究。

(一) 作为一部英雄史诗，它和藏族文化关系至为密切。要真正了解《格萨尔王传》的基本思想，就不能不涉及佛家学说。从英雄的诞生来看，格萨尔是天神投胎转世，下凡人间，这显然是藏族群众在佛教轮回转世学说影响下创造出来的说法。佛教在吐蕃王室的支持下，自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在吐蕃社会中流传、发展，并取得过一定的势力。人们把十世纪后半期的佛教称为西藏佛教，或称喇嘛教。西藏佛教与吐蕃时期的佛教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它是沾染了藏族社会中原有的一种巫教——本教的许多色彩，才成为西藏化的佛教。

(二) 作为史诗它必然是可以从史料中找到依据。《格萨尔王传》形成于七至十四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的藏族社会既是藏族社会形态急剧变革的时代，完成了从氏族制向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两次转变。史诗内容大多反映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或是与外族交战的历史，如《霍岭大战》、《羊同之役》、《大食之役》等。

(三) 从《格萨尔王传》整部史诗的艺术表现形式，可以看出它是以韵文为主体、散文与韵文相结合的。这与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话本，清代的讲唱文学略有相似。但变文、话本和讲唱文学，其唱法和曲调早已失传。史诗的谚语脍炙人口，形式多样。如二句体的“本想苦修建一座庙宇，不料却建成一个鸡窝。”三句体有“无父的人叔叔不收养，无母的人姨嫂不怜惜，无钱的人亲戚不救济”。类似谚语，在作品中俯拾即是。

这只是举例而言，每一篇作品都要联系到相关学科。史诗涉及了这个民族存在和生活的一切领域：历史、哲学、经济、思想、宗教、文学、语言、艺术、法律、天文、地理、民俗以及社会制度等，是藏族古代的百科全书。《格萨尔王传》是如此，其它民族文献的研究莫不皆然。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几千年来，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曾经有很多杰出的发明和卓越的成就。特别是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文化有条件得到普及。纸和印刷术发明以后，都先后传到国外，影响了整个人类的文明。

我国很早以来，就有众多的文献古籍。由于造纸、刻板印刷和活字版印刷的最早发明，使书籍的传播更加方便，文化的普及更加容易，可以说，对于世界文化有着极其巨大的贡献。

因为生活的需要，早在纸发明以前，我们祖先就已经找了好几种可以记录文字的东西。首先应该是甲骨，甲是乌龟的腹甲；骨就是兽骨，主要是牛的胛骨。使用甲骨大约是 3500 年以前的殷。目下有不少甲骨已经出土。甲骨的出土，使我们得以研究古代历史的大量资料，同时也看到 3500 年以前的文书。

继甲骨而当纸用的是竹简或木板。当时因为竹子、木板容易得到，人们将竹子、木板削光后在上面写字。这种狭长的竹片、木板，称之为竹简或木简，亦称版牍。竹简和木简用麻绳或皮绳、丝绳横串上下两头，编成“篇”就成为一册一册原始的书。在竹简或木板上，除了刀刻以外，主要是用铅或者黑色的木汁书写材料。春秋时，孔子读《易经》，因为读的遍数多，把编简的皮带磨断了三次，史称“韦编三绝”。战国时，旅行家惠施用几辆车子装载所带的书（竹简和木简）。秦始皇勤于政事，日理万机，每日所看各处呈文多达一百多斤。西汉东方朔上书汉武帝，用了三千根竹简，由两个人抬进宫，汉武帝竟看了两个月。竹木虽然材料易得，但体积笨重，携带不便，翻阅亦为困难。

正因为竹木简笨重，携带不便，人们又发明了用绢帛写字，也就是说，绢帛和竹木一样也是记录的工具。但是帛的成本太贵，不易普及。而纸的制造方法却给人们以很大的启发。汉和帝元兴元年（105 年），蔡伦初步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等一类东西，煮烂，变成浆，再在席子上摊成薄片，经过晒干

而成纸。后来又经过左伯不断改进，纸的数量也有了增加。到了晋朝，开始了用竹和藤作造纸的原料。经过不断加工改造，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造纸方法。

前面说过，甲骨文是用刀在甲骨上刻画，竹简和木简也是用刀在上面刻画。同时又有了石刻。汉灵帝时（175年），为了避免经籍在辗转抄写中发生笔误，便在鸿都门外，立了蔡邕写刻的石经，作为标准。隋朝时（600年左右），由于佛经的传播扩大，曾经雕印佛经。雕刻印刷可能从这时开始。有了石刻，有了纸墨，人们开始在石碑上拓印，用不着每篇抄写。这种读物，就是拓本，也称拓片。随之人们又把石碑上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再加以拓印，较之在石碑上刻字经济简便得多，为印刷术的发明开辟了道路。

雕版印刷到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时，我国的印刷业已经相当发达，刻书的范围很广泛，有诗文集、历书、佛经等。到五代时，又印刷了《九经》。这时，不仅是由官府刻印儒家经典，而且还出现了由私人出资刻印书籍。

宋朝时，印书事业更加发达，官家刻书的有五十多处，私家刻书更多。据现在所知道的，当时刻书出名的书坊铺子，就有二十多家，像建安余氏和临安陈氏等，刻书的地方也遍及全国各地，尤其是浙江、福建、山西、陕西、四川等省，宋朝雕版印刷的书籍，现在知道的就有七百多种。

雕版印刷确立了传播文化的基础。一种书，只要雕一回木板，就可以印很多部，比手写经济方便得多。但是，用这种方法，刻一部书，就雕一回木板，往往需要几年才能完成，无法迅速地、大量地生产书籍。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昇发明了用胶泥做的活字版。先用胶泥做成一个一个的小块在上面刻字，再用火烧硬，这就是活字。然后用松脂和纸灰等东西粘在铁板上，压平以

后，一块活字版就排好了。它同雕版一样，只要在字上涂墨，就可以印刷，印刷完毕，可以将字模取下来重排。

毕昇发明用胶泥做成活字版，印刷效率高，字丁又不浪费，比木板印刷有明显进步。但是这种活字，不易耐久，也不易上墨，印出来的东西还远不及写刻精美。元延祐年间（1314—1320年），王祜发明木刻活字，活字由胶泥而进入木刻，是印刷业上的一大进步，为了减轻排字工人来回寻找单字的辛苦，提高排字效率，王祜发明了“转轮排字盘”。《农书、杂录、造活字印书法》对木活字和转轮排字盘的制造和使用方法作了详细记载，现节录如下：“……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镏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楔楔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刷印之”，又有“写韵刻字法”、“镏字修字法”、“作盔嵌字法”、“造轮法”、“取字法”、“作盔安字刷印法”等。《农书》这几段珍贵详细的记录，使我们对木活字和活字盘的制造、使用和意义有了深刻的理解。王祜所造的木活字，大小高低一样，不用胶脂材料，合放在一个平正的木盔内，进行印刷。另外，依韵编号，一人按册喝号，一人从活字盘上按韵摘字，有条不紊地分工合作。不必人寻字。而字“就”人。他用这套木活字试印他自己纂修的六万多字的《大德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便印成一百部。可见效率之高。这种系统的机械化的活字盘的发明，提高了排印工作的效率，是印刷史上的重大成就。

木活字印刷术传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畏吾儿人用当时的维文刻印了不少书籍。二十世纪初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几百个古维文木刻活单字，系用硬木制成，刻制甚精，活字大小高低一律，和王祜所发明的木活字一样。以后这些字大多为法帝国主义者所盗走⑥。